

说，它不是直接挑战中华思想，而是试图通过地图这一形式间接否定中国文明的唯一性，从而让人们认识到西方文明/基督教文化的存在。然而，他的这种尝试在韩国和中国都没有成功。这一点可以通过一个人物了解到，他就是接受了中国不是世界中心这一事实的当时韩国的一位非常先进的学者——丁若镛。

依我所见，我不明白为什么在“中国”这个词中，这个国家是“中央”。同样，也不明白在“东国”一词中为什么这个国家是东方。太阳在头顶的时候叫正午。因此，我知道如果以正午为基准日出日落的时间相同的话，那么我所在的地方就是东西的正中间。（……）那中国这个名字是以什么为标准命名的呢？尧、舜、禹、汤之治者谓之中国，孔子、颜子、子思、孟子之学者谓之中国。^[3]

丁若镛接受了地球面貌的科学知识，放弃了地理上的中华思想，但始终坚持了文明层面上的中华思想。丁若镛的这一想法与康熙王朝具有代表性的性理学家李光地的想法一脉相承，李光地曾说过“且所谓中国者，谓其礼乐正教，得天地之正理，岂必而形而中乎”。认为以儒教文化为代表的中华文明是世界最高文明的态度并没有改变。韩国代表性的北学派学者洪大容在这点上也是如此。洪大容曾在1766年去拜访了北京的天主教会，与西方传教士进行了笔谈交流，“刘鲍问答”便是这段历史的记录。其中，洪大容这样写道：“论宇宙，制日历，西方学问甚高，前所未有。但他们的天主教却悄悄窃取我们儒教上帝的名字，并在那里用佛家轮回说来装点门面。其浅

陋可笑之极。”“刘鲍问答”中的“刘”指当时钦天监的最高负责人——监正刘松龄（Augustinus von Hallerstein），“鲍”则指副监鲍友管（Antonius Gogeis）。洪大容通过和他们的对话知道了地球周长为36万公里的事实，从“说地转一天”这句话也可以看出他知道了地球是自转的。因此，尽管他对西方传教士所掌握的科学知识发出“其说之微而深奥。”的赞叹，却同时批评天主教“其浅陋可笑至极”。

中国和韩国的知识分子共同秉持的中华思想、把西方视为野蛮的自豪感，在1840~1842年清朝和英国之间爆发鸦片战争之后，逐渐瓦解。韩国竖起斥和碑，上刻“洋夷侵犯，非战则和，主和卖国”，断绝与西洋的接触。这是面对西方文明时优越感与恐惧感同时作用而产生的一时性的自我保护反应。从中国的“中体西用”、韩国的“东道西器”和日本的“和魂洋才”中可以得知，之后历史的主要趋势就是研究如何在破坏中华文明或自身文明的优越性的基础上学习西方文明。但这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容易，因为文明不是以精神和物质来区分的，也不仅仅局限于是大炮、军舰、刀枪等几种武器。中国和韩国在学习西方的方法上经历了数次尝试，逐渐向全面西化的方向转变，也与上述情况有关。

鸦片战争后，中国的魏源等人提出“学夷技以制夷”的主张。他认为，输给西方是因为西方的器物文明比中国优秀，所以主张学习这些来战胜西方。于1861年开始的清朝的洋务运动，向西方派遣留学生，建立“北洋水师”引进西方军舰，便始于这种背景。然而，清王朝推行器物文明西化的片面态度，在甲午中日战争失败后便失去了立足之地。于是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等知识分子试图引入近